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麻窝羌语研究

刘光坤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麻窝羌语研究

刘光坤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10

责任编辑：李培英

封面设计：方 土

技术设计：杨 潮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书名	麻窝羌语研究
作者	刘光坤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印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0 千
版次	1998年10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
书号	ISBN7—5409—2116—1/H·69
定价	25.00 元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狄乐伦

执行主编:黄 行 薄文泽 梅思德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白丽珠	薄文泽	朝 克	陈其光	陈宗振
戴庆厦	狄乐伦	胡增益	黄 行	黄布凡
江 荻	柯丽露	李培英	梁 敏	林桦风
陆文娟	毛宗武	梅思德	欧阳觉亚	孙宏开
徐世璇	吴安其	吴宏伟	叶典良	张公瑾
赵明鸣	照那斯图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仅 1956 年，就组织了 7 个工作队共 700 多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遍调查，收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自那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一直不间断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初步统计，先后共调查了 100 多种语言，积累了 2000 多个点的调查资料。不仅掌握了这些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基本特点，而且大体弄清了这些语言内部方言土语的差异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者再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 50 年代收集的资料进行核对和补充，经过潜心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方言研究专著，如《黎语调查研究》、《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阿里藏语》、《红河上游傣雅语》等，在学术界得到较好的评价，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1991 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课题被批准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 10 多种语言被列入计

划,作为子课题进行研究。目前,这些子课题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将有一批新的方言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陆续问世。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情况复杂,多数语言内部有方言差别,有的语言内部不仅有方言差别,而且有次方言、土语等多层次的差别,方言内部的差别不同程度地造成民族内部交际上的困难。有的不仅方言之间通话困难,甚至土语之间交际也有障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揭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服务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规范;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向纵深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源,扩大我们的语言视野,丰富和提高方言研究乃至语言研究的理论水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成因复杂,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形成方言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为相关学科提供人文、历史、社会诸因素在语言中投影的证据,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列入本丛书的方言研究专著有两类:一类是对某一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研究,描写各方言土语的特点,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提出划分方言土语的根据。有文献的语言,还与文献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是以揭示该语言各方言土语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脉络为主要任务。另一类是方言研究单刊,是对某一语言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深入描写

研究,揭示它的结构特点。前者着眼于整体,后者着眼于深入。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激光照排室宋军同志负责排印,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了编辑好这套丛书,把好质量关,双方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为编审委员会成员。在此,谨向为本套丛书编辑、排印、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8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4)
第一节 羌族的历史	(4)
第二节 羌族的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	(8)
一、自然环境及资源	(8)
二、社会经济	(9)
三、风俗习惯	(10)
四、文化艺术	(13)
第三节 语言和文字	(15)
一、语言	(15)
二、文字	(22)
第二章 语音	(28)
第一节 声母	(28)
一、单辅音	(28)
二、复辅音	(33)
第二节 韵母	(37)
一、单元音	(37)
二、复元音	(41)
三、辅音韵尾	(43)
第三节 重音	(54)
第四节 音节结构	(57)
第五节 语流中的语音变化	(57)
一、构词中的语音变化	(58)
二、构形中的语音变化	(73)

第六节 借词对麻窝羌语语音的影响	(80)
第七节 语音专题研究	(81)
一、关于长辅音问题	(82)
二、关于复辅音问题	(86)
三、关于辅音韵尾问题	(99)
四、关于声调的产生和发展问题	(114)
第三章 语法	(128)
第一节 词类	(128)
一、名词	(129)
二、代词	(133)
三、数词	(139)
四、量词	(146)
五、谓词	(151)
六、副词	(196)
七、连词	(200)
八、语气词	(202)
九、结构助词	(205)
第二节 句法	(216)
一、单句	(216)
二、单句的分类	(229)
三、复句	(235)
第三节 语法专题研究	(241)
一、关于代词的格问题	(241)
第四章 词汇	(257)
第一节 词汇的一般特点	(257)
第二节 构词法	(259)
一、派生法	(259)
二、复合法	(264)
三、重叠、象形、象声构词法	(267)

第三节 借词	(269)
第四节 词汇专题研究	(273)
一、关于藏语借词问题	(273)
第五节 常用词表	(287)
后记	(348)

前　　言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里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羌族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本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又为羌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受到羌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专家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羌语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其中有闻宥、傅懋勤的《羌语萝卜寨的音位系统》,张琨的《羌语南部方言的比较研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视,1956 年组织了 7 个工作队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普查,当时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川北组就是负责羌语和嘉绒语调查的。1956 年 5 月,川北组在金鹏先生的领导下,共 9 人赴当时的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刷经寺。然后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黑水县调查羌语,一个小组去马尔康调查嘉绒语。羌语小组在黑水调查了麻窝和维古两个点,然后转到理县桃坪和汶川县绵池,各调查一个点。这次调查仅仅是试点,通过试点后,调查组于 1956 年年底集中在成都,整理试点资料,编写普查大纲,并于 1957 年春在西南民族学院培训调查人员,然后再开展普查工作。

1957 年夏,调查训练班结束,由第七工作队川北组、阿坝藏族

自治州民族语文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 3 个单位共 20 多人组成羌语普查队,分成 4 个小组对羌语进行普查,其中黑水 2 个组,茂县一个组,理县、汶川一个组。至年底,共调查了 28 个点,加上试点调查的资料,羌语实际调查了 32 个点。每个点都记录了一套词汇(约 3500 个单词)和语法(约 500—600 个例句),整理了语音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长篇故事,积累了丰富的的资料。

1958 年春,黑水县决定为小学教师培训羌语以辅助教学,阿坝州民族语文研究室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准备教材和进行教学的任务,我当时作为研究室羌语组的成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直到训练班结业。那段时间的工作,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基础。

1958 年初,第七工作队川北组完成调查任务后撤销,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当年夏天到阿坝州开展羌语和嘉绒语的研究工作。主要完成 3 项任务:(1)语言简志;(2)方言调查报告;(3)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发展中的作用。我和原语文研究室的 4 位研究人员被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借调到羌语组工作。

为了完成羌语方言调查报告,我们对 1957 年普查时各组收集的资料逐点进行实地复核和补充。在此基础上,对各方言土语的代表点的词汇和语法进行循环比较,以得出方言土语差异的确切数据。此项工作前后共进行了两年,直到 1960 年秋我调到北京为止。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羌语调查的全面资料,对羌语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也许是我在 1978 年重新回到民族语文工作岗位,仍然能开展羌语的一些专题研究的主要原因。

羌语方言差异很大,《羌语简志》描述的是南部方言的代表点——桃坪,为了使学术界能对羌语有一个全面了解,深入描写北部方言代表点麻窝话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填补对羌语介绍不全面的一个空白,我就是抱着这个愿望撰写这部书的。当然,将来《羌语方言研究》专著的出版,就能更全面地让读者了解羌语方言土语面上的特点,我想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不断

前　　言

深化的。

麻窝羌语是北部方言中的核心土语，黑水县讲羌语的居民都承认麻窝话最标准，各地都能听得懂，从地域上看，麻窝也是黑水县的中心位置，此外，可能还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如麻窝有一个比较大的寺庙；过去，黑水县最大的头人苏永和就住在麻窝，等等。正因为麻窝话在黑水地区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因此 1958 年对黑水县教师培训羌语时，也是以麻窝话为教学语言的。

羌族已经创造了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雅都土语曲谷话为标准音点的羌族拼音文字。北部方言内部比较一致，互相一般都可以听懂，当然曲谷话和麻窝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我想，它们的共性多于差异性。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羌语文的教学，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资料收集于 50 年代中后期，一些例句内容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尽可能作了一些增补和删节，但仍保留了少量带有时代特色的例句，如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但我们仅仅用来自说明语言现象，并没有肯定语言现象所反映的内容，特此说明。

第一章 絮 论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理县、黑水县、汶川县、松潘县，绵阳地区的北川县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也有羌族分布。总人口约 20 万(1990 年)。

第一节 羌族的历史

古代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兄弟民族，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古代文献中，往往把羌人描述为从事畜牧，且以牧羊为业的一个民族。《说文》中对羌的解释为：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太平御览》卷 794 中的《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羌为姜之一种。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为族名，“姜”从女，作羌人女子之姓。傅斯年也认为“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见傅斯年《姜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上古时期的治水工程，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开端，传说中的姜姓共工氏不仅是羌人中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部落之一。到了皇帝时代，姜姓部落联盟日益扩展，并大举向东发展。有名的“蚩尤”就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史》后记 4 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史书大量

第一章 绪 论

记载了蚩尤与皇帝、炎帝用兵的史实。例如,《史记·五帝本记》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皇帝,皇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庄子·盗跖篇》云:皇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帝王世纪》云:炎帝戮蚩尤于中冀。

由于皇帝、炎帝、蚩尤等部落之间长期征战,交往十分密切,他们逐步形成了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的前身。史书大量记载了尧、舜、禹与羌人的有关传说。例如《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帝王世纪》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记》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与石纽。考石纽的地理位置,《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水经·沫水注》广柔县云: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也。据徐中舒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见所著《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羌人与商王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现有甲骨文资料分析,当时的羌人可能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北羌,一为南羌。还在商代初年,羌人与商王朝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把羌人对商王朝的拥戴作为成汤伟大事业的标志,从而受到歌颂。《竹书纪年》载: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商王朝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羌人不仅没有趁机进攻,而且前来表示友好和慰问。后来“殷室中衰,诸夷皆叛”,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才逐渐紧张。武丁时期的大量方国,后来都日趋衰败,只有羌方直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期还依然存在。商代末年,商王朝向东南扩张,和西方羌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在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羌人得以修身养息,也造成了与周人联盟的时机。

周人在商代和羌人一样,常常和商王朝发生争战。武丁时期

的甲骨卜辞就有不少记录。后来周羌联盟，经过长时间的活动，广泛团结商王朝以外的各族力量，终于向商王朝发动全面进攻。周文王死后的第四年春天，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周武王“率兵车三万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王伐商，羌、髦率师会于牧野。”商王朝就是在周、羌等族人和中原人民的联合斗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兴的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局，只好继续周、羌联盟。宣王时期，王室力量有所恢复，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把若干羌人分封在今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中原地区，接受中原文化，他们与分布在甘青地区从事畜牧乃至狩猎活动的羌人形成了显著的差别，到春秋战国时期，入主中原的羌人，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青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大都被秦国所融合。未被融合的羌人，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由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惧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焚而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后汉书·西羌传》又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午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午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历史学界认为，现今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秦汉时期甘青高原南下在此定居的古羌人中的一支。《羌族史》作者认为：“据文献记

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叶,在岷江上游两岸,已经有氐、羌人的存在。公元前310多年,秦惠王派张仪及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在岷江上游东岸,从现在松潘经茂汶东部绵阳及温江两地区西部,包括今灌县、彭县一带设湔氐道。秦末汉初,氐羌人在这里开垦土地,经营农业,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公元前两世纪末叶,汉武帝积极开发西南地区,派遣司马相如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一度设置郡县,这对于促进羌、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岷江上游地区和内地的联系都具有积极作用。”(见该书211页)

隋唐时期,这一带的农业已经进入犁耕阶段,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唐代吐蕃势力强盛,逐渐向东发展,岷江上游成为唐与吐蕃两种势力争夺的场所。唐在羌族的核心地区设立茂州都督府,下属10个羁縻州,管辖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大渡河以东、松潘以南一带地方。以羌族部落首领为州刺史,统治其原有部落,实行世袭制,对唐朝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后来这10个羁縻州有9个改为正州,成为有编户的州县,由唐直接统治,一般仍以羌族为刺史。宋代沿袭唐的羁縻州制度,仍在岷江上游广设州、县。元代在设州、县的同时,设置了一些军民千户所,流官和土官并用。《茂州志》记载,明清时茂州的土司中,坤姓岳希长官司、董姓静州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和岳姓大姓上百户等的祖先,都是早在唐代就已经受封。由18世纪到19世纪末,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已基本完成。

清末民初,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运动对羌族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羌族人民自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1935年,红军经过羌族地区,解放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羌族人民。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军的支持下,羌族地区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羌族地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支前工作,组成了运输队、筑路队、担架队,筹办和运送军粮、军衣,修筑道路,护送和安置伤员,保证了红军的胜